

新发现旧石器遗址 16 处 采集石制品 1000 余件

安康旧石器调查取得突破性发现



三中遗址



沿途踏查



单家湾遗址



崔家湾遗址



河沿遗址



单家湾手镐

本报讯(通讯员 景玉薇)春节过后,陕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旧石器专项调查工作队对安康地区进行旧石器遗址专项普查。仅工作半个月时间,便新发现旧石器遗址 16 处,采集石制品 1000 余件。

本次调查路线自东向西从汉江下游向上游展开,分别在旬阳发现遗址 3 处,汉滨区 11 处,石泉县 2 处。遗址主要分布在石泉、月河、安康三个盆地。

安康盆地新发现旧石器 7 处,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崔家湾遗址的发现。该遗址位于汉滨区张滩镇崔家湾村附近,移民社区建设修建公路开槽挖掘了汉江右岸三级阶地及上覆的黄土堆积。建设中的公路将遗址分割为四个片区。仅一下午时间,4 名队员分别在四个片区共采集石制品 100 余件。安康地区之前从未发现过旧石器遗址如此丰富的地点。除了采集到大量常见的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在遗址西北角的台地上意外发现 1 件加工非常精美的手镐,是目前安康地区发现手镐中加工最精致的 1 件。

在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处暴露的长约 50 米、高约 15 米的黄土剖面上,可以清晰地辨别出 S1-S2 古土壤条带,并且在不同土层都发现了石制品,为该地点的石器定年提供了参照依据。根据先前团队对当地黄土状地层堆积物的研究结果,结合与秦岭以北典型黄土层序对比,可以推测出这些石制品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20—5 万年左右。

崔家湾遗址石制品类型既有小型的石英石片刮削器,也存在重型的石英岩刮削器,另外还有打制精美的手镐,反映出崔家湾遗址复

杂多样的石器加工技术。该遗址是目前安康盆地发现石制品数量最多的遗址,为进一步揭示区域石器工业面貌与未来开展区域性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汉江北部支流月河流域新发现遗址点 7 处,代表性的遗址有单家湾遗址。该遗址发现石制品近 100 件。石制品类型组合丰富,除了石核、石片以及各类修理工具外,还可见重型刮削器和手镐。其中新发现的手镐尖刃锐利,可能有特殊的使用用途。从遗址内随处可见的碎屑与断块分析,推测该遗址为一处原地埋藏的石器打制场所。

在石泉盆地新发现遗址点 2 处,虽然遗址点不多,但收获同样令人惊喜。除常见石器类型外,石核中可见两面剥片的饼状石核。工具则以重型为主,有重型刮削器、砍砸器、手镐、手斧等,其中手镐既有以长条状砾石为毛坯、单面修理一侧形成陡状刃缘、远端为圆锥尖刃的手镐,也有以大石片为毛坯两面修理、形成锋利刃缘的手镐,展现出多样化的石器加工技术。孙家湾遗址的发现表明石泉盆地的古人类活动区域多位于高阶地,为将来探索古人类的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调查,安康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点 16 处,采集石制品 1000 余件,初步查清了安康地区旧石器遗址的分布规律,廓清了该地区遗址的地层埋藏年代序列,基本查明了该地区石器工业技术演化的面貌,并证实古人类在安康地区生活的年代最少不晚于距今 80—70 万年前,并一直延续到距今二三万年之间。

(来源:文物陕西)

用匠心与担当塑造品质之城

通讯员 钱运立

在安康市市政园林处,提起廖邦友,同事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 1972 年出生的老党员,现任安康市市政园林处党委副书记、副处长,扎根基层 33 年,用匠心与担当书写了一座城市的成长故事。他先后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气象灾害应急先进个人、安康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多项荣誉,成为安康市政建设的一面旗帜。

从山区走出的“筑路人”

廖邦友的成长之路,与山区农村的交通困境密不可分。从小目睹乡亲们跋山涉水的艰辛,他立志改变家乡的交通状况。从省交通学校毕业后,他毅然回到石泉县交通局,从基层岗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用所学知识服务家乡建设。

调入安康市市政园林处后,他依然保持着务实本色。他深入调研,勤于思考,力求每个项目方案最优化、投资最节省。33 年来,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8 篇论文,主持的《一种具有自洁功能的固液分离装置及化粪池》获国家发明专利。他依托东坝汉江大桥等项目进行关键技术研究,多次获得省级科技奖励。

攻坚克难的“铁先锋”

廖邦友的工作态度可以用“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来形容。他带领团队以精湛的技术和出色的管理能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文昌南路建设项目中,面对高挡墙和高填方的技术挑战,他统筹考虑质量、安全、投资及工期等因素,编制专项作业指导书,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完工,成为城市建设的典范。在环城干道江北段建设项目中,他攻克了道路线位型技术难点,制定了科学方案并成功实施,建成了安康市里程最长、等级最高、功能最全的市政道路工程。

在东坝汉江大桥建设项目中,他负责质量安全及技术管控工作,引进第三方检测监控机制和大桥建设全过程视频监控平台,确保工程按期建成并荣获国家级优质工程奖。此外,他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了长春路立交跨襄渝铁路转体大桥项目,成功实现单个 T 构转体质量 1.6 万吨、跨度 85 米的转体任务,该项目荣获陕西省优质工程奖。

为民服务的“暖心人”

廖邦友深知,只有建设好“大家”,才能让千万个“小家”过上幸福生活。在安康“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他再次肩负重任,担任长春片区项目指挥部技术管控组组长和新关庙汉江大桥工程建设组副组长。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两个项目均获评市级文明工地。

为破解地方财政压力,他成功包装世界银行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项目,争取外贷资金 4 亿元,推动 17 个项目包顺利实施。

廖邦友牵头制定市政园林设施运维细则和考核办法,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消除安全隐患 200 余个,确保群众脚下的安全。

他还组建“市政橙”党员突击队,高效处置 26 次城市内涝及旱情灾情,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他坚持开门问策,倾听群众需求,发布《一江两岸公园广场“微改造、精提升”征集意见》,建设 3 座市政“红色驿站”,为市民提供生活服务和帮助。红色驿站被表彰为全省新业态就业群体党建品牌,他负责的支部也被授予全市首批“五优党支部”荣誉称号。

廖邦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的名字和“市政铁军党旗红、园林城市争先锋”的党建品牌一起深入人心。他用智慧和汗水塑造了一座品质之城,为安康城市建设和行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只要人不懒 就能干出个样儿」

通讯员 向超

在旬阳市棕溪镇硃石村的烟田里,总能看到一个单薄却倔强的身影,她手握锄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地里给烟草育苗。这个被乡亲们称为“女能人”的农家妇女柯玉兰,即便腿脚残疾,也宛如坚强的勇士,在致富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柯玉兰先天性下肢残疾,加之丈夫体弱多病,整个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正在她一筹莫展时,镇党委号召大力发展产业,村干部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各类种烟的惠农政策走进柯玉兰家。柯玉兰的内心五味杂陈,她既兴奋又担忧。种烟对一个常人而言都是颇具挑战的农事,更何况她和丈夫这种身体状况。

然而,经过多天的深入思考,柯玉兰没有被困难吓倒。她心中那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如同火苗一样越烧越旺。她主动找到村干部,想在本组后坪梁栽种烤烟。柯玉兰并非盲目决定,她本身有着种植烤烟的经验,并且后坪梁这块地方独具优势,海拔高使得昼夜温差大,是一块种烟的好地。“只要人不懒,勤快一点,我们争取干出个样儿来。”在她的再三劝说下,家里人也逐渐被她的信心和决心所感染。

搭建工棚,整地复垦,育苗、移栽,为了方便干活,她和丈夫索性将家都搬上了后坪梁,镇村领导被她这种精神所感动,为她们挖通了到烟地的公路,解决了栽烟的交通运输问题,这让柯玉兰的信心更足了。她尽心呵护着自己种植的每一棵烟苗,在无数个清冷的寒夜,在无数次跌倒的路上,她始终坚信要自立自强干出个样儿来,要把日子过在人前。

一年又一年,一片片“黄金叶”,铺就了柯玉兰的致富路,现如今柯玉兰一家也在集镇上安了家,从十几亩种植地到现在的 60 亩,从夫妻二人到现在用工 10 余人,从贫困户到现在的致富带头人,柯玉兰用残疾的身躯托起生活的希望,用真真切切的汗水,干出个样儿来。

她的故事,正如那些向阳生长的烟苗——风雨折不断向上的渴望,残缺遮不住生命的光芒。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自立自强的精彩篇章,彰显了身残志坚有担当、自立自强绽芳华的风采。

抗日民族英雄王范堂

王范堂(1908—1987),原名王模,号懿斋。陕西省石泉县人。

1923 年,王范堂入石泉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26 年毕业于,到柳镇镇小学教书。1927 年 4 月,经老师陈雨皋介绍,考入冯玉祥在西安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学习。1930 年 4 月,蒋、冯、阎大战爆发,军校结束,王范堂被分配到冯玉祥部任排长,因作战英勇,升任连长。11 月,冯、阎失败,冯玉祥下野,王范堂率部投奔冯玉祥旧部孙连仲。嗣后,孙连仲投靠蒋介石,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6 路军,王范堂任第 158 团 3 营 7 连连长。1931 年春,蒋介石调第 26 路军赴江西进攻红军。“九一八”事变后,驻扎宁都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不抗日却对红军大肆“围剿”十分不满。12 月 14 日,该军 1.7 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与 73 旅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王范堂参加红军,任文化教员。

1932 年 6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战中,王范堂与国民党军队殊死拼杀,负重伤昏迷。因其在战斗中脱去衣、帽,竟被国民党军队中的熟人误认为他与红军作战受伤,送往南昌住院治疗,出院后再次分配到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 27 师 158 团 3 营 7 连连长。1936 年 9 月,被师部派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范堂率先向军校呈交了抗日参战申请书,要求立即奔赴抗日前线。两日后,军校令全体学员迅速返回部队。他在河北保定赶上孙连仲率部北上抗日的第 26 路军,仍任连长。1937 年八月间,王范堂参加了河北良乡县琉璃河防御战,率全连官兵给日军以重大杀伤;10 月,率部参加山西娘子关阻击战,再次重创日军,并击毙日军七十七联队长里查少将。

1938 年,在台儿庄战役中,王范堂率部全连仅剩的 57 人,自告奋勇任敢死队长,冲进日军阵地,消灭日军 60 余人,大批日军溃退,敢死队只有王范堂等 13 人生还,清除了攻占台儿庄西北角的全部日军,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基础。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范堂和敢死队战友受到嘉奖,夜袭台儿庄成为当时轰动国内的重要新闻。王范堂也因战功升任第 158 团 3 营营长。1938 年 9 月,王范堂任第 27 师直属的第 110 团副团长,率部在大别山、河南南阳等地与日军周旋。1942 年调防重庆,参加石牌要塞保卫战。1946 年,王范堂任国民党第 30 军 27 师 79 团团长。

1948 年冬,王范堂任国民党第 30 军第 30 师少将副师长,1949 年春开往成都驻防。12 月 23 日,该师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兵约 7000 人在成都通电起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王范堂奉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0 年 12 月毕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学校军事教官。

1952 年 7 月,王范堂转业回到石泉,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3 年,王范堂西北军大结业,分配到陕西汉中地区工作。1976 年,王范堂退休。1987 年 5 月因病逝世。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